



从叙利亚难民危机看西方民主输出的“罪与罚”

□ 刘海霞

【摘要】叙利亚自2011年3月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以来，不仅没有盛开出灿烂的民主之花，反而是极端势力猖獗，最终造成25年来最严重的国际难民危机。叙利亚危机又殃及欧洲，2015年11月13日法国巴黎市中心遭受“伊斯兰国”的连环恐怖袭击，造成逾百人死亡。文章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并给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提供启示。

【关键词】叙利亚 难民危机 西方民主 启示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只破不立的“炸弹+民主”输出模式，在叙制造了25年来最严重的国际难民危机

“市场、民主和美国的权力曾被视为冷战后支撑世界的三个领域”，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一切都开始黯然失色。尤其是随着危机的持续蔓延，不仅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本身的缺陷日渐突出地显露出来，移植西式民主的很多国家也陷入战乱和动荡之中。资本主义的政治合法性遭到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福山甚至发出“没有优质国家，就没有优质民主”的感慨。台湾学者朱云汉也指出，美国作为积极推动民主的唯一超强，却是劣质民主的最大传染源。它提供错误示范，输出政治伎俩，为外国政治人物提供“专业服务”，且经常采取自我矛盾的双重标准。“阿拉伯之春”国家尤其是叙利亚的境遇即是最好的明证。

叙利亚冲突爆发后，不仅经济上受到美国、欧盟、东盟等的制裁，政治上陷入国际纷争，而且国内还饱受战乱之苦。各方力量只是把叙利亚当成相互博弈的地缘政治舞台，就像普京所批评的：一些西方国家“借助火箭和炸弹‘输出民主’”，却对叙利亚国内真正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历时多年，叙利亚冲突爆发伊始示威者打出的“改革、增加自由、改善民生”等口号一个也没有实现，反而最终在叙利亚造成影响世界的巨大难民潮。

根据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调查结果：从叙利亚内战爆发的2011年3月到2015年6月8日，已导致超过32万人丧生，其中有统计的死亡人数为23万多人，其中平民死亡人数最多。叙利亚经济也在战争中面临崩溃，整体水平倒退30年。

西方民主本身已经沦为选举民主，只要程序正确，选举出亲西方的政权就算达到目的，但是“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

之冬”的上演，已经显示出这种逻辑的谬误之处，也是叙利亚的前车之鉴。

2010年年底至2011年年初在突尼斯爆发的“茉莉花革命”迅速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引发了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的剧烈变革，一度被认为是“第四次民主化浪潮”。统治者长期连任、政治腐败不堪、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高企，几乎是这些国家的通病。然而四年多过去了，这些国家并没有如人们所愿走上政通人和、富足自由之路，更没有迎来阿拉伯世界民主的春天，而是政权频繁更迭，军人干政现象突出，教派和族群冲突严重，经济显著倒退，失业率大幅攀升，政局剧烈动荡，在权力真空的状态下，极端组织大行其道，“伊斯兰国”恐怖主义趁乱成长为主要威胁。利比亚2014年由于石油生产出现中断GDP增长率为-24%左右；也门2012~2014年GDP年均增长2.82%，但与2010年前年均4%以上的增长仍相去甚远，贫困率增至33.7%，青少年贫困率高达54%；埃及虽然历经波折、几经动荡，甚至经过了“二次革命”，但在外部压力下实现的大选根本不足以酝酿出真正的民主政治体制，依然是军方势力为代表的强人政治。突尼斯情况虽然稍好一些，并迎来了第一位民选总统，但其政治过渡在阿拉伯世界不具有普遍意义。

美国学者亨廷顿早就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指出，“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度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由此可见，缺乏西方民主土壤的阿拉伯之春的失败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匈牙利科尔维努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欧洲一体化和安全政策专家加利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当初对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干预，就是用新政权替代‘独

裁’政权，推广‘民主’，但现在这被证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作为美国的盟友，欧洲国家也参与其中，美国和欧洲（对难民问题）负有很大的责任。”

“以叙制叙”的代理人政策造成叙利亚矛盾丛生、利益激化

叙利亚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美国及其中东盟国的眼里，叙利亚与同为什叶派的伊朗、黎巴嫩一向交好，与俄罗斯关系密切，与以色列以及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关系不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甚至认为伊朗可能在叙利亚政府军帮助下，试图在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建立第二条恐怖战线”。因此，美国一直视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为眼中钉，与海湾国家都支持打击叙利亚。基于此，在叙利亚冲突爆发前，美国就支持反对派攻击巴沙尔政权。

西方的直接介入和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更激化了叙利亚国内的矛盾。首先，反对派内部管理混乱，人员构成复杂，与叙利亚民众缺乏紧密联系，把希望主要寄托在西方身上，目的只在夺权而不在解决叙利亚人民的民生问题，因此其影响力逐渐缩小，难以达到西方的预期。反对派成员还一再被证明对平民施虐，不断失去公信力。其次，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对中东地区的投入大大减少，直接影响了叙利亚问题的解决。2014年5月奥巴马在西点军校的讲话直接体现了美国战略的调整与收缩：“我们必须调整我国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吸取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转而与国内有恐怖主义基地的某些国家进行有效的伙伴合作。”美国采取发动空袭而不派遣地面部队，支持叙利亚温和反对派打击巴沙尔政府和伊斯兰国的“以叙制叙”的代理人政策，不仅没有控制局面，反而使极端势力和恐怖力量急剧增长，一些反政府军战士不断投降“支持阵线”等极端组织。这种分化使反对派内部矛盾不断，“反对派之间的矛盾甚至超过了它们与巴沙尔政权的矛盾”，“叙利亚自由军”甚至被认为已成“背景”。再次，在和叙利亚政府合作与否、巴沙尔政权去留问题上以及究竟伊斯兰国还是巴沙尔政权才是西方头号敌人等问题上，美国和俄罗斯意见不一，巴黎遭恐怖袭击之后欧洲立场也有所转变，这些国际力量态度的摇摆也严重影响着叙利亚危机的解决。第二次叙利亚问题维也纳外长会议2015年11月14日就叙政治进程时间表达成共识，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应在6个月内通过谈判组建过渡政府，18个月内举行大选。然而如果国际力量不与叙利亚政府形成合力打击伊斯兰国，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终止叙利亚战争，一切时间表都将是纸上谈兵。近来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更使这一进程增添变数。

西方的介入使叙利亚教派冲突也更为严重。叙利亚由什

叶派中的阿拉维派掌权，阿拉维派仅占全国人口11.5%，巴沙尔政权即属阿拉维派，而逊尼派则占全国人口的68%，少数派掌权本身就埋下了教派冲突的隐患。联合国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叙利亚冲突“越来越具有教派冲突性质”，政府军和其支持的民兵对逊尼派平民展开攻击，而反对派的武装组织则对阿萨德总统所属的阿拉维派和其他支持政府的少数族裔发动进攻。法国情报研究中心推出的新书《阿拉伯革命：不为人知的一面》对西方操纵阿拉伯革命进行了无情揭露，该书的牵头者埃里克·德内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发挥了巨大影响，它们从2002年就开始筹划“阿拉伯革命”，为有关国家培训积极分子。这些组织是真正的颠覆者。在搞乱俄罗斯周边所有国家后，美国便将矛头转向阿拉伯国家，并使用同样方法。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对这些国家输出民主和人权的结果都事与愿违，不符合当地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西方盟友的利益，只符合美国的利益。

“只管打不负责善后”的态度尽显西方民主的虚伪性，最终引火烧身

马克思曾说，“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自己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这一判断在西方国家对叙利亚危机的处理上得到了验证。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手制造了叙利亚危机，却不肯认真解决由此引发的难民问题。迫于国际舆论和欧洲盟友的压力，美国官方2015年9月宣布计划在明年接收至少1万名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然而法国遭恐怖袭击之后，反对接收难民的呼声一再高涨。2015年11月18日公布的民调数据显示，53%的美国民众受访者不愿接收叙利亚难民，支持奥巴马政府的难民接收计划的受访者比例仅为28%。美国新泽西州、佛罗里达州等31个州的州长宣布不欢迎叙利亚难民。美国国会众议院2015年11月19日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审查每个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人不会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后再准予避难。这一法案设置的门槛大大增加了美国接收叙利亚难民的难度。美国政府在中东的空袭行动一小时就用掉6.8万美元，但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却由于资金严重短缺而迟迟得不到解决，美国的这一做法深受国际舆论的谴责。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由于战争或者各种问题造成的治理乱局已不仅仅是本国的灾难，而必然会向国际社会蔓延。欧美向叙利亚等国民民主输出产生的恶之花更是让欧洲尝到了苦果，难民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安全危机令欧洲各国疲于应对。

《都柏林协议》规定难民在其进入的欧盟第一个国家注册申请避难，大量难民入境后急于中转到较富裕的西欧国家，使既



有协定面临严峻挑战。欧盟国家内部对难民分摊计划亦存在严重分歧,甚至影响了欧盟的团结和政府间的信任。德国是欧洲对难民最宽容的国家,到2015年10月底正式登记的难民数字已达到75万多人,但是现在国民的情绪也开始分裂,今年共发生近五百起袭击难民案,是去年的三倍,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移民问题为欧盟带来的严峻挑战甚至超过希腊债务危机。深陷经济危机的意大利和希腊更是对安置难民问题不堪重负。积极军事干预叙利亚的法国对难民问题也态度复杂。据法国《20分钟报》2015年9月5日报道,Odoxa最新民调显示,大部分法国民众认为,法国不应效仿德国放松叙利亚人获得难民身份应符合的条件,只有36%的人认为叙利亚人作为战争难民应获得更好的接待。更为严峻的是以“反欧盟、反移民”为口号的极右翼势力很可能会利用民众排外情绪而趁机扩大影响力,从而使各国的难民政策更加难以推行,甚至使欧洲陷入政治危机之中。

针对欧美自己一手造就了这次难民危机的批评,欧盟回应称缺乏民主、法治,还有贫穷才是难民危机产生的根源。西班牙《起义报》网站2015年9月7日报道直斥这种论调,认为叙利亚“内战”并不是纯粹的内战,而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友这些国家为了在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从外部策划的一场侵略,是帝国主义政府该直接承担的罪责。伊朗总统鲁哈尼在联大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公开指责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和波斯湾逊尼派穆斯林国家只是在“滋养恐怖主义和分裂势力”。叙利亚新闻部长祖阿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美国等西方国家制定的中东政策“是基于其自身利益,反恐只是其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和借口。”“那些暗中支持极端组织的国家必会引火烧身。”英国前驻叙利亚大使安德鲁·格林也认为,由于西方不了解中东地区复杂的情况,对该地区的干预使局势更糟,在中东地区绝不可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此外,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欧美的相互指责与推诿已经影响了二者关系。

正确认识西方民主输出的本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信念

西方从来没有放弃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民主输出的行为,受此影响,社会上不时有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声音,主张中国实行三权分立、多党制、宪政民主,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西方国家假以民主与自由之名在叙利亚等国的所作所为以及造成的严重后果,使西方输出民主的本质昭然若揭,对此我们必须有非常清晰的认识。

针对这种现象,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

要的工作。2014年5月6日在北京发布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中也指出,西方国家民主输出、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等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报告建议,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政府如果不能有效抵御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将严重影响本国政治思想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鉴于此,我们应高度警惕西方民主输出的渗透,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持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阿拉伯国家民主实验的失败使得学者和政府智库们重新考虑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性。朱云汉指出,当前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是如何提升国家机构的各项治理能力,管理市场秩序,监察公司治理,保障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进行财政转移与二次分配,强化内部监控防止违法滥权,确立政府维护公共福祉的价值导向。他还指出,21世纪是“国家治理能力”竞赛的世纪。最近许多以援助发展中国家为职责的国际组织已意识到,国家建设比民主建设更为关键,但也更为艰巨。在现代国家机能发育不全的情况下,贸然实施普选式民主,反而可能阻碍国家能力建设。福山甚至认为不论在伊拉克还是叙利亚,美国的问题似乎在于,美国人根本不懂何谓国家建设。

中国同样也面临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我们在悠久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其独特优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伊朗总统鲁哈尼、埃及总统塞西都明确表示要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总编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执行主编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撰写的《第四次革命》一书也认为,中国和新加坡等东方国家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探索将会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中国的民主模式和发展方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条非西方的另外的发展路径,西方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认可,更凸显了我们的制度优势。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不断呈现,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日益激烈,西方新干涉主义不断抬头,我们对此应该时刻保持警醒,提高防范意识和危机意识,充分认识到国家治理体系中业已存在的问题以及复杂的国家环境,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责编/丰家卫(实习)